

子曰



樂貴明述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人民出版社

樂貴明述

子曰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序

楊潤時

樂貴明先生把運用『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爬梳、校審而輯成的《子曰》清樣送我，並邀作序。我自知並不具備相應的學力，可以在講國學、說《論語》的熱浪中恰當地評論此書以及『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價值和意義，但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應允下來。這是因為十幾年來我一直肩負着與『工程』有關的一份沉重囑託。

樂先生在跋語中說：『二十二年間，日月風雨，我不敢一日懈怠，也沒有懈怠一日。』這番夫子自道，沒有一點虛飾和矯情，這二十二年每一日，都留下了這位文化園地苦耕者篳路藍縷的足印，其中必然浸透着學人的追求和心血，而對樂貴明先生來說，竟還有屈辱和淚水。當我拿到《子曰》清樣，並得知這個被譽為擁有海量數據的『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基本建成，運用這個『工程』已完成了中國歷史日曆庫、《通行本廿四史誤例》、中國歷史地圖資料庫、《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等一大批成果時，最想做的，就是祭一瓣心香，告知首倡把計算機技術引入古典文獻研究領域並時時導引的錢鍾書先生，告知對這項事業給予深切關懷和巨大支持的胡繩先生。這

兩位前輩九泉有知，一定會舒心一笑。

『文化大革命』中，同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的樂貴明與錢鍾書先生結下忘年之交。那時樂貴明是一名助理研究員，經錢先生點撥，他潛心研究《永樂大典》，歷時十年，終於取得重要成果。此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經成立，世界上的新技術浪潮衝擊着我國學術界並引起關注。其時有權威人士倡導把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的理論和方法引進社會科學研究，一時間，『三論』成為學術時尚。不久，果然出版了一些新著作，裏面充滿了可能連作者也未必弄懂的概念和話語。後來這類著作慢慢淡出了大多數學人的視野。一九八二年，當樂貴明以關於《永樂大典》的研究成果向錢鍾書先生『交卷』的時候，錢先生又向他提出，下幾年功夫，解決用計算機技術支持古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問題。當時，樂貴明還不能真正理解錢先生提出這一項目的深遠的學術意義，但是憑着對錢先生的信仰和尊崇，他接下了這一任務。從此在這一領域慘淡經營二十餘載，歷經外人所難以體味的種種艱辛、熬煎，並終於以一系列成果開出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和研究的新天地。

承接中國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這一項目，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具有豐厚的

古典文獻學養，二是具有較高的軟件開發水平，三是能夠潛心治學、百折不撓。樂貴明的實際狀況又如何呢？他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古典文獻專業知識基礎，在從事關於《永樂大典》的研究中又進一步開闊了版本學、文字學、訓詁學等方面的學術視野；他在錢鍾書先生指導下，以十年時間潛心研究《永樂大典》，已顯示出具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豬肉』的優良治學精神。問題在於，當時他對計算機技術一無所知。可是，這恰恰激發了他的探求新知的欲望。他的這種探求精神中含有一種另類的灑脫。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許多人都知道樂貴明是個『愛玩』而且『玩』出一些名堂的人。『十年動亂』時期，樂貴明一面泡在古籍裏，一面逍遙地鼓搗起半導體一類的營生。他淘換零件，組裝了半導體收音機、電視機，外觀雖然簡陋，却可聽可看，竟引來不少擁躉。晚近以來，京城世家子弟中有這樣一批『玩家』，其中如王世襄老先生一類名門後裔，有文化、有學養，視金錢為身外之物，『玩』得專注，『玩』得精緻，甚至在艱苦竭蹶之中也能『玩』得瀟灑、『玩』出意境，一旦歸納爬梳，竟成專門學問而彰顯於世。這是中國傳統學人中一種比較獨特的文化現象。我與樂先生相交二十多年，感味出他的行狀中透現着這種『玩家』

風範。

樂貴明先生就這樣開啟了開發研製『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艱難歷程。當時，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沒有經費。二十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學研究所擁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學術大家，樂貴明作為晚生後學難以通過申請研究項目而獲得科研經費，況且那時的學術經費少得可憐。樂貴明拿出工資積蓄，變賣一些家當，錢鍾書先生又支援一些稿費，終於買來一台蘋果機。他就一頭扎了進去，把所有能利用的時間都花在學習計算機原理上。那時計算機中文錄入方法還不成型，容量較小的漢字簡體字庫不能滿足錄入古典文獻的需要。樂貴明就從研製計算機漢字繁體字庫入手，進行了原創性、奠基性的研究工作。苦幹幾年，一部容納五萬多個繁體字而且具有繁體字生成功能的全漢字庫終於被他攻克下來。運用這個全漢字庫，他完成了《論語數據庫》，並於一九八六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正式出版。錢鍾書先生為這兩個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技術的奠基性成果感到非常高興，為《論語數據庫》題寫了兩個書名，從中選用一個他認為較好的。錢先生為樂貴明修改該書前言時，還寫下這樣一些發人深省的評論：『從理論上來說，計算機和人類使用過的其他工具沒有甚麼性質的不同，它在還未被人廣泛使用的時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總會遭到一些抗拒。慣

用舊家什的人依然偏愛着他們熟悉的工具。有了紙墨筆硯「文房四寶」，准還有人用刀筆和竹簡；有了汽車、飛機、電報電話，也還有不惜體力和時間的保守者。對新事物的抗拒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抗拒新事物到頭來的失敗也是歷史常給人的教訓。」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獲知有關情況後，興致勃勃地來到樂貴明工作的地方，觀看了成果演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汝信、李慎之、丁偉志等院領導也去現場觀摩，表示出極大的興趣。

但是，古典文獻的計算機處理工作才剛剛開始。面對古典文獻海量的數據，面對詩詞歌賦一類有韻、有格律的作品的正確錄入和快速檢索等難題，一方面需要研製新的軟件，一方面需要大量設備和錄入人員。這就又涉及經費問題。找所裏，所裏解決不了；找院裏，院裏也不能立項。樂貴明一遍遍跑院科研局，王煥宇局長下決心冒一次風險，同意從院科研經費中撥出十萬元，以借款方式給樂貴明，並約定了還款時間。樂貴明就以這種非常規方式投入了新一輪研製活動。

一九八八年十月的一天，樂貴明到辦公室找我（我當時擔任社科院副秘書長），講述了開發研製《全唐詩數據庫》的情況，表示經過反復測試，證明《全唐詩數據庫》研製成功，請求以新聞發佈會形式向社會公佈；他同時還說明，計算機室現有

設備足可抵頂向科研局借支的十萬元，要求以實物還賬，然後把計算機室人員遣散。『借款搞科研』這種事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所未有、聞所未聞；『拆廟還債』更是令人甚感荒唐。另外，如果這個具有填補空白意義的重大學術項目確屬研發成功，那就應該進一步扶持並擴大研究成果，而不是拆廟散攤子。我遂向樂先生表示，待經調查後再予答復。經向院科研局瞭解，確有樂貴明借款協議一事，科研局暫時不能對《全唐詩數據庫》作出評估，因此一時無法作出答復。我又在計算機室等處瞭解到，兩年多來，樂貴明基本吃住在計算機室，埋頭於《全唐詩》軟件研製，為集中精力攻克軟件研發難點，竟然多次在計算機前連續工作四十多小時，以致手足僵直，最後只能被人從椅子上抬下來，放到床上休息。而所謂計算機室，不過是社科院大樓一層和地下室用來堆放雜物的幾間屋子，樂貴明帶人歸置打掃後改成工作間，夏天悶熱潮濕，冬天寒氣逼人。當時，在樂貴明身邊已經聚集了林滄等幾位計算機專業人員，同時又招收一批高中畢業學歷的學員參加錄入工作，其中如田奕等經過刻苦努力，已經在軟件開發研製方面達到較高水平。根據所瞭解的情況，我向胡繩院長和常務副院長丁偉志作了報告，並建議：邀請中科院計算機所等單位專家，對《全唐詩數據庫》及有關軟件的設計原理進行論證評估；組織本院有關學者對該數

據庫的適用性進行論證評估。胡繩、丁偉志二位同意這一意見，並由科研局負責組織召開了兩場評估會。計算機專家的評估會對該軟件給予了很高評價。院內專家評估會氣氛也很熱烈，來自文學所、語言所、歷史所、文獻情報中心等單位的學者觀看了現場演示後，提出了很多具體問題。有一位紅學家請求當場檢索，看一看《全唐詩》中有沒有出現過『紅樓夢』一詞，出現過幾次。兩分鐘後，計算機給出答案：在包括三千二百七十六位作者，總計五萬三千三十五首作品，總字數達到三百四十三萬字的《全唐詩》中，『紅樓夢』一詞共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四七二卷蔡京的《詠子規》，另一次是《補遺》卷十一屬名馮袞的《子規》，兩位作者都是唐末人，詩的字句相同，都有『凝成紫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裏心』。從而證明了曹雪芹從浩瀚的文化寶庫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紅樓夢》不是無根之木。這樣一部信息繁巨的《全唐詩》如果是人工一頁一頁翻檢那要耗費多少時間，而且難免出現誤差。許多老學者興奮地說，做學術研究查書抄卡片是件很辛苦的事，所以常有『皓首窮經』的感慨。有了這種數據庫，可以在一兩分鐘時間裏查到需要的資料，還可以進行各種比對，又有高精的準確性，這就大大延長了我們的學術生命。學者們紛紛議論說，僅就《全唐詩數據庫》而言，它不但可以運用於古典文獻、語言文字研究，還可以

運用於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工作，如果把中國古典文獻都做成數據庫，則其功能、效用會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社會科學研究在手段、工具、方式等方面會發生革命性變化。可以說，這項研究工作『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在這兩次權威性論證評估會基礎上，經院裏批准，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下旬在院學術報告廳舉行了中國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技術成果新聞發佈會。丁偉志副院長介紹了《全唐詩數據庫》以及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技術方面的其他研發成果的基本情況和專家評價，樂貴明先生回答了記者提問，田奕女士做了現場演示。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發表了關於《全唐詩數據庫》研發成功的消息。錢鍾書先生首倡把計算機技術應用於中國古典文獻研究和整理，始終密切關注這項新興領域研發工作的每一步進展，經常向樂貴明垂問有關情況，時時給以啟示，並多次把自己的稿酬交給樂貴明用於支持這項研究。遵照錢先生的囑咐，這一切當時都不為外間所知悉。《全唐詩》速檢系統完成後，錢先生以他一貫的淡泊平和，沒有公開作出什麼評論，我現在猜想，那是避免把關注的目光轉移到他的身上。直到半年多以後，錢先生曾給我寫來一封短信，說：『文學所樂貴明同志等關於《全唐詩》速檢系統的工作獲得可喜的成果……作為一個對《全唐詩》有興趣的人，我經常感到尋檢詞句的困難，

對於這個成果提供的絕大便利，更有由衷的欣悅。這是人工知能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的重要貢獻。」正是受了錢先生這封信的啟示，樂貴明等人又運用《全唐詩數據庫》編印了共有三十三大冊的《全唐詩索引》。這是中國第一套運用計算機軟件編輯的大型古典文獻索引，我曾在上海福州路書店看到這套新書展示在櫥窗裏。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胡繩院長在率團訪問蘇聯之前的一次會議上，初步議定把當時屬於文學研究所的計算機室改建為院計算機室，同時把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確立為院重點科研項目，從經費、人事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給予支持和保障。胡繩院長囑咐我繼續關注這項工作。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我隨胡繩院長訪問蘇聯回國，獲知在此期間，樂貴明帶領計算機室人員夜以繼日，又完成了院外委託的《紅樓夢數據庫》，令人甚感欣慰。不久，著名導演尤小剛帶領大型電視紀實片《神州第一街》攝製組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據尤小剛導演介紹，這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重點項目，將向海外播出。其中有一集要反映中國社科院近期科研活動和重要科研成果，因此需要社科院給予支持。我負責接待了他們，並按照院黨組指示，安排他們到院有關部門和一些研究所座談採訪。幾天後，尤小剛導演表示，對計算機室剛剛

完成的《紅樓夢數據庫》甚感興趣，決定以此為主要攝製內容。他們邀請了汝信副院長和著名紅學家蔣和森等學者，對這一成果的成功研製和學術價值以及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技術問題發表觀感和評價，並到計算機室現場拍攝了一些鏡頭。據說播出之後，反響甚好。不久，經過院裏批准，樂貴明又帶着《全唐詩數據庫》等一批成果，應邀出席了廣交會。由於去得晚，經費又有限，只好租一個較為偏僻的小展臺，沒想到參觀和諮詢的人絡繹不絕。廣交會還沒結束，海外媒體就有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唐詩數據庫》以及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研製工作的報道和評論。有幾篇評論詳細比較了臺灣、香港地區以及西方一些學術機構相關開發研製工作成果，認定中國社科院的古典文獻計算機軟件研發工作處於領先地位。好運氣來了誰都擋不住，接二連三的喜訊降臨到樂貴明和他的計算機室：《全唐詩數據庫》被授予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文學科研究成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此殊榮。院黨組決定，樂貴明破格晉升研究員；正式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任命樂貴明為該室主任；批准計算機室的學員陸續轉為社科院正式職工；田奕成功研製了《全宋詞數據庫》，並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的碩士學位……那些日子，小小的計算機室充溢着過節一樣的氣氛。

但是，運命弄人，福禍無常。誰都不曾料到，一場持續近十年的磨難這時悄悄逼近了樂貴明先生。而打開這場磨難魔法瓶蓋子的竟是樂貴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樂貴明除了向錢鍾書先生討教學問，還幫助錢先生辦理一些生活事務，從『五七』幹校返回後，樂貴明又擔負起為錢先生借書等一些事務。我曾經當面問樂貴明，他于錢先生是弟子？是秘書？樂貴明笑道：『是，又都不是。楊絳先生常常對錢先生和我說：「你們是朋友」，我卻又不敢當。』我能感受到，錢先生和樂貴明這種忘年之交裏凝結着很深的感情、很深的信任。正因為這樣，樂貴明在錢先生面前便口無遮攔。有幾次說到，在興辦院計算機室過程中發生了有人侵佔公財的跡象。錢先生聽罷，嚴命樂貴明如實向法院領導彙報，樂貴明就帶着相關證據材料到有關院領導那裏舉報。待我得知，情況已經很嚴重了。舉報的事情雖有諸多證據可以證實，但被舉報人仍然好官照做；舉報人樂貴明卻被戴上『經濟問題』的帽子，陷入無休止的審查：先是院內財務大檢查，然後請院外會計事務所查賬，越查不出問題這種審查越是升級。當時參與此事的院監察局的負責人找我談話，對這種審查的動機和方式都表示極大的懷疑，擔心發生惡劣的後果和影響。這期間，樂貴明苦悶、不解，往日緊張繁忙的計算機室籠罩着不安的氣氛，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九九三

年七八月間的一天，樂貴明和田奕被檢察院傳喚，他們在計算機室的辦公桌、書櫃等被徹底搜查，書籍、軟件、現金、存摺等一應個人物品被扣押。不久，樂、田二人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從此處於司法監控的狀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座學術殿堂發生的這起變故，引起不小的震動。許多人，包括錢鍾書先生，關注着這令人眩目的變化，不能理解卻又十分無奈。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正式調往最高人民法院。當年底，獲知錢鍾書先生在北京醫院住院，我即去探望。楊絳先生讓我坐在錢先生身邊。未待我講幾句問候的話，錢先生就垂問起我在新單位的工作情況，又指着楊先生打趣地說：她的父親曾經是司法官（楊先生父親楊蔭杭先生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擔任過總檢察長），你們是同行。聊了半個多小時，錢先生仍然興致很高，我怕打擾太久，遂起身告別。錢先生從沙發上站起來，神色凝重地拉着我的手說：『樂貴明的事情我管不動了。我把樂貴明託付給你了。』聽完此話，我心血上湧，竟一時語塞。走到病房門口，錢先生又拉住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說：『我把樂貴明託付給你了。來，我們擁抱一下告別。』當我與錢先生擁抱那一剎，感到他那瘦弱的身軀竟那樣的溫暖。楊絳先生在病房走廊送我出去時，感慨地說：『鐘書很少用這種方式與人告別，今天我都有點意外。他

這真是對你鄭重囑託啊。」一九九七年八月，法院開庭審理樂貴明案，起訴的罪名是貪污。幾經庭審，舉證、質證、辯論，法院最終判決樂貴明無罪。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旬，當判決書下達後，樂貴明到北京醫院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錢鍾書先生。錢先生自一九九七年夏天手術後失語。聽到這個判決結果時，潸然流下兩行熱淚。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錢鍾書先生逝世。生前，錢先生遺言，不搞告別儀式，不留骨灰。只可由楊絳先生以及若干好友送別。遺體火化那天，楊先生在錢先生遺體四周灑滿了玫瑰花瓣，錢先生一如生前神色安詳。前來送別的有錢先生親屬，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秘書，副院長王忍之，已經退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還有樂貴明、田奕和我等幾人。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劉雲山也前來向錢先生遺體告別。楊先生在樂貴明、田奕的陪伴下，一直等到火化完畢，把骨灰妥善處理後才離開八寶山。

樂貴明已被法院宣告無罪，但事情並未完結。這時的計算機室已經七零八落，樂貴明無法繼續在這裏從事『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開發研製，於是按政策規定申請提前退休，但一直不能獲準。一九九八年三月，胡繩同志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任上卸職，當年夏秋的一天，胡繩同志的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說：『胡老請你到他家

去一下。』我即到胡繩同志家看望。胡老因病幾次開刀，行動不便，坐在輪椅裏，但還是滿面紅光，不顯病容。胡老與我談起社科院工作的一些往事，並問我是否瞭解樂貴明的近況。我就所知向胡老作了介紹。胡老告訴我，他一直關注着樂貴明這件事，但限於當時的情況（胡繩同志自一九九〇年就不再擔任社科院黨組書記），不便發表意見。現在真相清楚了，法院有判決了，應當總結一下這件事的教訓。他得知樂貴明申請提前退休受阻等有關情況後，給社科院主持工作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樂貴明及其計算機室一案是他任社科院院長期間院內發生的一起最突出的冤案，頗為之不安。希望准予並處理好樂貴明退休的事，如有牽連的人也希望妥善處理。我在胡繩同志身邊從擔任院辦公廳主任到擔任院副秘書長，工作了九年多時間，還從未聽到他用這樣沉重的語言評價一件涉及知識分子政策的個案。拖到二〇〇〇年七月，樂貴明終於接到通知，所裏和院裏批准他提前退休；田奕也辦理了退職手續。樂貴明退休、田奕退職前，分別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給予行政記過和行政記大過的處分。曾經紅紅火火的計算機室隨之作鳥獸散。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樂貴明自從在錢鍾書先生指引下在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領域開出一片新天地，他就把這項事業認定為後半生的學術追求。

從學部時期算起，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了三十餘年，在這裏度過了人生最好年華。如今，悔也罷，怨也罷，說到底，他依然深愛這裏的學術傳統，眷戀這裏給過他關懷、教誨、支持和幫助的師長、同仁。

現在，他不得不離開這裏，但他並沒有放棄已見成果的研究事業。樂貴明經歷了被審查期間最初的苦悶日子，就在家中鋪開攤子繼續研製開發的工作，陸續又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所以，當他提前退休之後，就把田奕等流散在外的以前的合作者邀集起來，重起爐灶。『中國古典數字工程』這個項目早已引起海外學界的密切關注，曾不斷有人表示願意提供經費支持或進行合作。其中就有臺灣著名學者朱邦復先生，他在這一領域亦取得了諸多重大成果，並與樂貴明先生彼此仰慕，神交已久。退休後的樂貴明在這些學者的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開發研製，終於把中國古典文獻計算機處理這項事業推上了新的發展階段，完成了一系列創新性重大成果，《子曰》便是其中的一項。這些成果，為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為新時期的先進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孕育、壯大、傳承的幾千年歷史演進中，歷經無數次